

一部学术上宏伟的“未完成交响曲”

——读“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 □贺绍俊

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生前留下一部音乐经典《未完成交响曲》，它的未完成性反而构成这部经典的独特艺术魅力。因为这一缘故，当我读到由张志忠领衔主编的“莫言与当代中国文学创新经验研究”丛书时，不由自主地要将其称为一部学术上宏伟的“未完成交响曲”，仿佛只有这样说，才能凸显它所蕴含的独特学术价值。

当然，“未完成”只是一种比喻式的说法，作为一个重要的社科研究项目，这套丛书的完成度是相当高的。该丛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莫言文学道路与中国文学的变革经验研究”的结项成果，共有9部专著，涉及“文学创新之路研究”“以莫言为中心的新时期文学变革研究”“莫言及新时期文学变革与中外文化影响研究”“从鲁迅到莫言：百年中国乡土文学叙事经验研究”四个方面，其视野之开阔，研究之深邃，观点之新颖，都是非常突出的。我想，它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是学术性。这套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长年在某个方面进行研究的专家，他们的这次写作也是建立在多年学术思考的基础之上的，其学术的深度与厚度相当突出。以张志忠为例，他在莫言上世纪80年代刚刚崭露头角时就开始评论莫言的作品，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持续不断地追踪着莫言的创作。他为这套丛书所写的专著《莫言文学世界研究》集数十年研究之精华，非常扎实，其学术思路明显指向这一课题的核心：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他对莫言的研究也是建立在对改革开放40年历史的整体认识基础之上的。他认为，改革开放40年，最值得重视的是农民的创造性，而莫言的小说正好印证了中国农民强大的生命力。他着重从这一角度理解莫言所创造的文学世界，同时也认为，对莫言的研究，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学化的中国经验。又如李晓燕的《神奇的蝶变——莫言小说人物从生活原型到艺术典型》，作者以田野调查式的严谨态度，对莫言小说的人物原型做了系统翔实的调查，在此基础上，将原型人物与文本进行对照研究，再进入到莫言的精神世界，做得很细致。又如陈晓燕的《文学故乡的多维空间建构——福克纳与莫言故乡书写比较研究》，着重从差异性对莫言和福克纳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差异性的比较便能有效地触摸到中国经验和本土性的关键。

其二是当代性。何谓当代性，这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定义的概念，我更愿意将当代性理解为既有时代感也包含权威性和与时俱进的意思，就是说它要面对当代文学的发展趋势，面对一种不确定



性，面对未来的指向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套丛书具有鲜明的当代性，研究者的学术触觉完全伸向当下的文化语境，敢于直接面对最前沿的文学现象。如张志忠对莫言文学世界的研究，就把研究延展到对莫言研究的研究，探讨了莫言研究中的新要素，如误读莫言的问题及莫言获奖以后的文学处境等，并对如何拓展其学术空间作了很有说服力的展望。又如江涛的《从“平面市井”到“折叠都市”——新时期文学中的城市伦理研究》，将伦理学引入文学叙事研究，通过中国数十年城市化进程与城市书写的关系，历时性地提出市井空间、异托邦空间和缝隙化空间三类空间的阐释及其伦理诉求，所讨论的文学作品和现象也密切与当下有关，比如还详细讨论了近期出现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折叠”这个词甚至还成为他进行学术想象的切入点，从而以“空间折叠”这样一个关键词贴切地描述了城市书写中出现的新的伦理问题，这样的理论思路和阐述正是得益于作者锐利的当代意识。

其三是开放性。该丛书的主题从莫言文学道路入手，探讨中国文学的变革，它不是一个单纯的莫言研究课题，而是将莫言作为一个典型个案，作为一个中心，由此辐射到整个百年中国文学的变革以及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这样一个由点及面的研究课题，一般来说会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由外向内，就是从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广阔的纵横面上寻求多个切入点，而每一个切入点的研究都回归于莫言文学道路这一中心。这种思路的优点是具有完整性和中心突出，有助于对莫言研究的深化和细化。但是，张志忠所率领的学术团队所采取的，则是另外一种思路，即由内向外的思路，他们从莫言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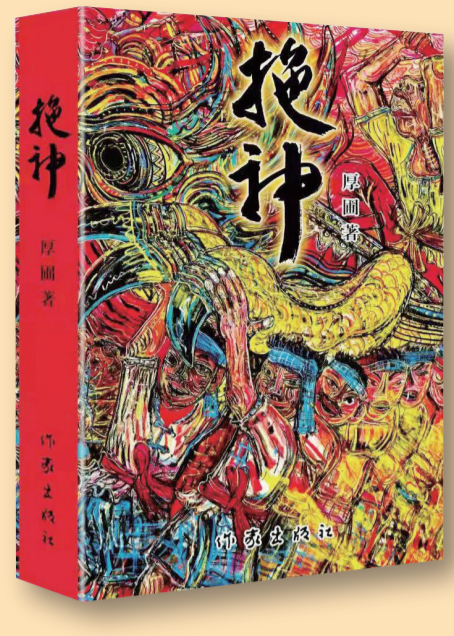
这一中心出发，寻求向外延展的多条路径。这是一个充满了开放性的研究思路，这就是为什么关于城市文学的研究、关于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的研究也纳入了丛书内的缘由。开放性同时也极大兼容了世界性的视野，也就是说，它强化了研究课题在整个世界文学的格局中来看中国文学的视角，例如李楠的《海外翻译家怎样塑造莫言——（丰乳肥臀）英、俄译本对比研究》，这部专著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莫言获诺贝尔奖，有一种说法非常流行，认为莫言获诺贝尔奖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完全改写了莫言的小说，是译文改写适应了诺奖的口味，并不是莫言作品本身征服了诺奖评委。李楠针对这个说法进行了非常细致的文本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葛浩文的翻译没有改写莫言的小说。樊星主编的《莫言和新时期文学的中外视野》则立足于全面梳理莫言与世界文学的关系，由此探讨新时期文学的成功经验。

其四是包容性。这套丛书的研究团队在学术上倡导民主精神，能够包容不同方法、不同理论，尽可能地发挥大家的思想。因此这套丛书是一套方法多样、风格迥异的学术丛书。包容性还体现在以包容的态度来处理研究项目的取舍。他们并不强行要求作者一定要以莫言研究为中心，而是以百年中国文学发展和突破这一大的目标统领丛书的书写。像江涛的城市文学研究和王春林的《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经验研究》看似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课题无关，但这两部书实际上为以莫言为中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阔的背景，因为只有了解了1990年代以后城市文学的兴起，你才会对莫言的小说世界获得一个更全面的了解，而莫言后期主要成就在长篇小说上，因此了解新世纪长篇小说叙事特点，实际上就是为莫言后期长篇小说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注解。

最后，我要特别强调的是，这套丛书还有一个特点是它的“未完成性”。我是受舒伯特音乐经典的启发而这么说的，我所说的“未完成性”，是指这套丛书的主题不仅非常宏大，而且它可以不断向外延伸。这套丛书围绕一个宏大主题开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头，有意思的是这套丛书并没有穷尽这一主题的阐释点，而是为人们提供了继续言说的可能性。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这既是学者们需要认真研究的理论课题，同时，它又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这一实践仍在路上，仍在形成新的现实，仍在产生新的问题。无论是对中国社会来说，还是对中国文学来说，世界性与本土性交汇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实践。既然这一实践尚未完成，这套丛书所开启的学术路径就完全应该继续进行下去。

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浅谈厚圃长篇小说《拖神》 □峰千朵



鹏程等，也都曾经有过善良和勇敢，有过正义和抗争，他们的悲剧事实上是那个黑暗腐朽社会的悲剧，是时代大潮遗下的污泥。他们的经历从另一个侧面引发了我们的深思：个人在时代洪流中该如何自处，如何实现自我的人生价值？这也许就是这部作品的“灵魂”一问。

关于这个问题，作者用主人公陈鹤寿的成长，深刻地揭示了它的终极答案。陈鹤寿是个普通人，他没有什么超能力去拯救世界，也不是天生自带光环，他甚至一开始就落入了命运的泥潭。他曾因“造反”而受通缉，逃亡途中诱拐了天真少女暖玉，他也曾为一己私利“踏食”，引起蜚议和家族的纷争。他造神的初衷是因为看不起女神，他还为了自己的乌托邦掀起过樟树埧的雨雨腥风，但就是这么个逐“利”也有“义”的小人物，却书写了一个时代的商海传奇，同时成为了抗击洋寇人侵的民族英雄，完成从普通人到“超人”的转变。

所谓“超人”，就是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用自己的生命意志去创造，追求自身生命能量的增长和完满，最终确立和实现自己的生命意义。陈鹤寿就是这么一步步地，在不屈不挠的践行和思索中完成了自身的转变，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临济录》中有言：“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如果说人生就是一次修行，在陈鹤寿的成长中，诱惑和困难就是这路上的“神魔”，他挥刀就斩，在“破”中“立”，“终成”“正果”，在现实世界中追求梦想，在梦想中实现对现实的超越。陈鹤寿这个人，不仅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成为人人敬仰的平民英雄。无论是对于人类还是我们的民族，只有拥有这样的平民英雄，历史才能丰满起来，变得更加有血有肉，有情感，我想这大概也是作者深藏意图，想要通过作品对人生意义和现实意义作出探究和回答。

最后我想再说说作者在《拖神》小说里架构起来的世界观。首先从小说名字来看，“拖神”是潮汕平原颇具特色的民俗活动，当地人以扳倒神偶、惩罚警醒神明的方式，祈求来年丰收富足。作者这么取名，显然不是为了引发同乡人的共鸣或外乡人的猎奇，也不是为了从存在主义的角度去讨论人鬼神是什么样的存在，而是去探索人类生活的三种主要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作者把这样的世界观、认识观和价值观放在樟树埧来表达，也有自己的思考：潮汕人这个族群，是中国乃至华人世界一个独特的存在。潮汕平原因为地处偏僻，自古是人流放之地，又是草莽英雄出没之所，由外来人组成的樟树埧，更像是改革时代的深圳，没有太多的条条框框，敢做敢立，敢于“造神”也敢于“拖神”，而诸神之争正是人类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作者在人、神、鬼的“相爱相杀”中“神”化了人，神鬼皆因人一念而起，依附于人，没人人也就没了神鬼，这是因为人是最重要的，不应该“是什么”，而是成为什么。小说在第十章“与神一战”中，把人对自我命运的主宰力量推到高潮，这不是武力的胜利，而是选择，是意志，是反思的胜利，也是人类的胜利。至于人生意义的两大难题“死亡和欲望”，该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厚圃也在小说中用陈鹤寿等多个人物，甚至用鬼魂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小说的结尾，鬼魂喝下忘川水后自问“我是谁”，这点睛之笔将宏大收缩于渺小，将群体收归于个体，从自我到忘我，正所谓“一念放下，万般从容”。

可能有人读了此书，会觉得《拖神》的基调和结局有点温吞脉脉，不够有痛感，似乎深刻的作品都应该该卸下生活光鲜的外衣，将疮痍戳破、将伤口撕裂，展示给大家，最好再往伤口上撒把盐，让痛更痛，让丑更丑，让黑暗更黑暗，但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厚圃大概就是有着这样英雄梦想的作家，在面对精神世界与现实世界的撕裂痛苦时，仍执意书写人间的温暖，传递人生的价值，这是加倍的勇敢，是更高的超越，因为他知道了世界的本质之后，仍然选择单纯而又勇敢地赋予生活别样的意义，用有温度的手来缝补世界和人生的碎片，审美也审“丑”，哪怕面对人生的虚无、生存的困境和人性的“恶”，厚圃也要让它开出花来，就像厄尔·波德莱尔一样。

远去的乡土，永远的乡愁

——读王剑冰散文集《塬上》 □张陵



是作家体验和感悟乡村生活的重要成果。不过，作品的思想完全超越了“地坑院”文化，进入民族文化的大格局里，回溯中国“瓦”的历史，品读中国“瓦”的魅力，升华中国“瓦”的哲理，写得非常精彩，是一篇高品质的散文之作。

《旷野》《陡河》《辽阔》则是作家描写少年时期乡村生活场景的作品，放到“塬上”这里，似乎是作家寻找到了乡土文化一脉相承的精神，感受到那远去的乡土里，永远不变的乡愁。《地气》则把乡愁的内涵点了出来：所谓地气，就是你的乡村，你的故土，是那些庄稼那些草木，是生你养你的父老乡亲。地气就是你故土上的思念，对家乡的认识。说白了，地气就是你的底气。写的是地气，指的就是一个人的乡愁。有了乡愁，就接了地气，人就有底气。而《收藏》《流水深处》等篇则是作家对他另一篇散文《绝版的周庄》的情感补充和延伸。这个江南文化小镇名气大，底蕴足，去写的人很多，留下的好作品也很多，而王剑冰找到了自己与众不同的写法，写出了属于自己也属于周庄的乡愁。可以说稳健平静是这部散文集的调性，而乡愁则是这部散文集的魂魄。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后记里，重点提到“深入生活”这个概念，提到这些优秀的散文作品，与他深入生活的三年有着“生命”一般的关系。这种认识，是对文学基本关系的深刻认识，也是对散文创作的深刻认识，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很长时期以来，作家如何真正深入生活一直是个难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散文创作更是这样。当代散文创作的理念，讲读书学史，讲知识积累，讲做人立德，讲才华感觉，可“讲生活”的不多。讲“深入生活”的更少，给人一个误导，以为散文创作靠的是多读书、多悟性，由此忘记了“深入生活”才是根本。要写出好作品，就要“深入生活”，所以王剑冰自觉走向生活，与乡村生活无缝对接，在塬上一住就是三年多，虽然很孤独，却也洗掉了身上许多浮躁之气，突破个人生活的小格局，回归真正的乡村生活，从真实的乡村生活场景中，从朴实的农民身上捕捉到创造生活的理想和力量。

个人的精神境界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格局也就开阔了。同样是表达乡愁，多数散文联结更多的都是历史，都是典籍文献，都是个人感觉。而王剑冰的乡愁，联结更多的是地气，是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这一联结，就对路了。其实，乡愁说到底并不是文人的惆怅和伤感，而是百姓生活的地

气。这些年，散文创作在努力突破，一会儿是女性散文，一会儿是历史散文，一会儿是传统文人散文，一会儿是新散文。看上去很热闹，其实思想突破进展都不是很大。究其原因，就是不接地气，接不上地气。王剑冰倒是没有什么标新立异，只是更深刻地意识到要“深入生活”，寻找生活的重要性，自觉自愿回归生活，回归乡村。从这个意义上说，王剑冰散文的乡愁，是接地气的乡愁，也因此是家国情怀的乡愁，时代的乡愁。

每一个小说，都会有自己关注的重心和写作的优势。小说写乡土，更多会注意到现代化进程中乡村与乡民之间的矛盾冲突关系。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严重破坏乡村传统的生活，也带来人性的失落和危机，最后的思想落点通常会落在“人的问题”上。因此，乡土常常会成为被现代化进程所困扰、所困惑的知识分子精神理想的寄托。他们通常会通过小说来表达对现实的反抗、对人性的呼唤。报告文学写乡土，则带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在揭示“三农”问题的严峻中探索发展“民生”之路。报告文学思想落点在“民生”，不在“人性”。当今散文写乡土，恐怕要在“乡愁”上花大气力，才会展现自己独有的思想分量，形成写作的优势。乡愁不光是一种怀旧的情绪情感，更是一种文化和文化的传承。历史、现实和人生在散文里，都会化为一种文化的表达，一种乡愁的延续。抓住乡愁，不仅是散文的时代任务，也符合散文的创作规律。在这个思想层面说，《塬上》是坚持散文规律、探索散文创新的一次重要实践，对当代散文如何写好乡土、如何表现乡愁而言，是一个重要的范本。